浅析印度崛起的制约因素

楼春豪

内容提要：国际社会关于印度崛起前景的争论很多。除了关注经济与军事等硬实力指标外，政府治理、社会发展以及国内安全也是重要的分析视角。基于从这三个视角的分析，印度崛起前景面临不少制约因素：印度政治机制内在矛盾拖累政府治理能力，社会发展滞后拖累可持续性发展，国内安全现实威胁侵蚀发展成就。

关键词：印度崛起　政府治理　社会失衡　国内安全

20世纪90年代以来，印度保持20余年的经济快速增长，军事实力突飞猛进，成为国际力量格局中举足轻重的新兴力量，与中国、俄罗斯、巴西和南非同享“金砖国家”（BRICS）的美誉。不过，印度未能在次贷危机和欧债危机中独善其身，经济下滑明显，街头政治频发，一度看好印度的西方舆论也发出“唱衰”之声，称之为“褪色金砖”。诚然，有关印度崛起前景的争论仍将持续，且无人能给出明确的答案，但可以肯定的是，衡量国家崛起的指标并非经济、军事等单项，还包括政府治理、社会发展与内部安全等维度，后者甚或是更深层次、更具决定性的因素。本文试图从政府治理、社会发展及内部安全威胁等方面，探讨制约印度崛起的非经济因素，以求更客观、辩证地看待“印度崛起”的命题。

一、政治机制内在矛盾拖累政府治理能力

政治机制与经济发展存在密切逻辑联系，印度亦不例外。独立初期，开国总

楼春豪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海洋战略研究所副所长、副研究员。

理尼赫鲁深受社会主义思潮影响，主张强化国家对经济政策的规划干预，“英殖民帝国”（British Raj）让位于“许可证帝国”（License Raj），印度成为“唯一（数十年）没有走向自由市场经济的民主国家”。[1] 20世纪90年代初进行经济改革后，印度政治机制发生重大变革，政治力量分化重组，呈现“联盟政治”、“选举政治”、“腐败政治”和“家族政治”四大特征。这些特征将在相当长时间内得以延续，成为影响或者制约印度崛起的重要变量。

印度政治机制的“联盟政治”、“选举政治”、“腐败政治”和“家族政治”四大特征，将长期成为制约印度崛起的重要变量。

（一）“联盟政治”增大政府决策难度，制约决策效率

独立后相当长时间里，印度都处于国大党一党独大的局面，“当时的印度被普遍认为是非西方世界中少数几个政治稳定的民主国家”。[2] 政治稳定“对印度的政治整合发挥了重要作用，保持了国家在意识形态上的基本一致和政治生活中的团结，从而为印度的现代化进程创造了稳定的社会条件”。[3] 20世纪70年代以来，印度各种新兴社会力量发展壮大，不同利益集团追寻多元利益诉求，依据不同的身份特性，不断集聚化并形成各自的政治势力，出现政治宗教化、种姓化、地方化和碎片化的特征。在分化、重组过程中，印度的政治生态逐渐从“一党独大、众星拱月”演变为“多党并存、群龙无首”。特别是自1991年经济改革以来，两大全国性政党（国大党和印度人民党）中的任何一个政党，都无法单独执政，彼此也难以联合执政，而是必须依靠其他小党组建执政联盟，小党作为“关键第三方”往往能影响政府组建和稳定，进而拥有对政府决策的巨大影响力。以国大党辛格政府力推的经济改革为例，辛格政府早就计划开放零售业、减少对能源进口行业的补贴、改革养老金制度等，但都因政治阻力而夭折。2012年9月中旬，辛格政府出台经济改革措施，再提开放零售业的问题，遭到执政联盟内部的强烈反对，重要盟党“草根国大党”直接退出执政联盟。再比如，辛格政府对孟加拉国和斯里兰卡的外交政策，就分别受到与两国接壤的西孟加拉邦和泰米尔纳德邦地方政党的掣肘。2013年底德里大选，高举反腐旗帜、成立不足一年的“平民党”异军突起，跃升为德里第二大党，其领导人甚至短暂出任德里首席部长。2014年印度大选，国大党遭遇滑铁卢，印人党获得史上最好成绩，成为近30年来首次单独获得半数议席的政党，“联盟政治”的困境看似可以打破。但是，印人党获得的选票数不足40%，印度政治力量多元化、碎片化的格局短期难以根本

1 Joydeep Mukherji, “Economic Growth and India's Future,” Occasional Paper No. 26, Center for the Advanced Study of Ind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March 2006, p. 4.

2 孙士海、葛维钧：《列国志·印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33页。

3 陈金英：《社会结构与政党制度：印度独大型政党制度的演变》，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89页。

改变，地方政党的角色依然吃重，印度政府在制定内外政策时往往投鼠忌器或者掣肘众多，影响决策效率。

（二）“选举政治”催生投机主义，导致决策短视，难以出台长远有效的发展规划

出于选举考虑，许多政治势力刻意迎合“平民主义”，忽视长期经济发展规划，甚至不惜违背经济发展规律。印度政府出台的许多民生政策初衷很好，但在具体执行过程中的负面影响不容忽视，特别是当印度经济形势整体下滑的情况下，很多“非生产性”的民生政策对经济的制约影响被放大。比如，在卢比贬值、国际原油价格上涨的大背景下，给柴汽油提供大量补贴的政策加剧政府赤字压力，使政府缺乏足够的财政手段刺激经济。再比如，“平民党”执政德里后，祭出的第一张牌就是“禁止外资投资德里超市”，这或许可以保住很多“夫妻店”生计，但长远看却违背消费者利益和经济发展规律。这种“竞争性平民主义”（competitive populism）的现象在大选前尤为明显，各政党都会在竞选期间打出平民主义的旗号，抛出诱人的民生计划吸引选票，而忽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有学者一针见血地指出：“印度的经验表明，民主有时也会在很多方面阻碍发展。竞争性平民主义——为了赢得大选的短期诱惑——可能损害长期投资，特别是在基建领域。比如，此类政治安排使政府很难收取公路、电力、农田灌溉等领域的费用，从而无法吸引投资。竞争性平民主义还使印度无法像中国那样，在改革进程中采取试验田的政策。在印度，即使一个项目失败了，也很难减少损失或撤离出来，因为撤出项目意味着就业机会丧失，并给选举造成负面后果。如此，政治家根本就不想搞改革实验。”[1]

（三）腐败问题深入肌骨，严重影响政治经济正常秩序

印度的腐败问题非常严重，已经成为印度政治肌体中的恶性毒瘤，难以彻底清除。有学者估计，“印度政府官员通过腐败获得的款项高达184.2亿美元，约占GDP的1.26%”。[2] 印度“媒体研究中心”（Centre for Media Studies）调查显示，大约20%的人承认在过去十年的竞选活动（包括中央和地方）中，遭遇过“选票换现金”的情况。在“透明国际”2013年的腐败指数榜上，印度位列第94位，排名与菲律宾和吉布提一样。[3] 2009年二度执政的辛格政府深受腐败问题困扰，2009年英联邦运动会、2010年2G牌照项目的腐败程度令人震惊，直接导致英

1 Pranab Bardhan, *Awakening Giants, Feet of Clay: Assessing the Economic Rise of India and China*,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0, p. 144.

2 “How Much Do the Corrupt Earn?” *Hindustan Times*, December 9, 2011.

3 参见 “Corruption Perceptions Index 2013,” http://www.transparency.org/cpi2013/results，2014-3-2。

联邦运动会组委会主席、通信部长等锒铛入狱。2012年8月17日，印度审计总署发表报告称，印度政府在2004年7月至2011年3月期间，向一些私企贱卖国有煤炭资源，造成约330亿美元的损失，更是引爆新一轮反腐示威潮。反对党开展“封锁议会”行动，议会完全陷入瘫痪。2013—2014年，印度多个地方邦举行大选，国大党都表现糟糕，很重要原因是腐败问题严重损害其形象。此外，印度大选成为有钱人的游戏，金钱政治催生金钱议员，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腐败问题。2004年和2009年的两届大选，在财富排名靠后的20%候选人中，仅有1%的机会赢得大选，而财富排名靠前的20%候选人胜算率高达25%。[1] 这种拼经济实力而产生的议员，其素质自然难以恭维。2009年当选的第15届人民院，有162名议员受到犯罪指控，犯罪情节严重的（如涉及绑架、谋杀等）有76人，占议员总数的14%。在地方邦议会中，约31%的议员至少卷入一起刑事案件，大约15%涉嫌严重犯罪案件。“在法制脆弱、社会等级非常明显的情况下，政客们经常利用其罪犯声誉作为资本，显示其有能力保护所代表族群的利益，无论是物质上的安全，还是获得政府利益与社会保障”。[2]

（四）家族政治严重，弊端不可忽视

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都有一些政治大家族长期居于权力顶峰，一些政客仅凭借其出身就能轻松赢得大选。在中央层面，尼赫鲁家族长期执政，先后诞生了尼赫鲁、英迪拉·甘地和拉吉夫·甘地三位总理，现任国大党主席、拉吉夫之妻索尼娅·甘地也被认为是“辛格总理背后的头号实权人物”。某种程度上，尼赫鲁家族已经成为凝聚国大党的精神符号。在地方层面，旁遮普邦、北方邦、卡纳塔克邦、泰米尔纳德邦、查谟·克什米尔等，都有长期掌握地方权力的“地方诸侯”。比如，旁遮普邦的首席部长（地方邦最高行政首脑）帕卡什·辛格·巴达尔（Parkash Singh Badal）与副首席部长苏克比尔·辛格·巴达尔（Sukhbir Singh Badal）是父子关系，帕卡什于1970年、1977年、1997年和2007年四度出任首席部长一职；北方邦的现任首席部长阿基莱什·亚达夫（Akhilesh Yadav）也来自当地政治望族，其父亲曾三次出任北方邦邦长。在强势政治领导人（如尼赫鲁、英迪拉·甘地）执政期间，领导人甚至可以决定谁代表政党参加选举、谁有资格出任政府部长等。其结果是，个人或家族权威较强，党内民主未能起到有效监督作用，有时甚至出现“党产即家产”的现象，“由于缺乏党内民主，政党好比家

1 Milan Vaishnav, “Crime but No Punishment in Indian Elections,” January 24, 2014, http://carnegieendowment.org/2014/01/24/crime-but-no-punishment-in-indian-elections/gz9k,2014-2-12.

2 Ibid.

族封邑，且依赖大量非正规的企业赞助。”[1] 推动近两年2G丑闻调查的政治家斯瓦米（Swamy）在接受笔者访谈时指出：“印度政治家族为了确保自身利益延续下去，在政党建设、政策制定等层面，千方百计设计符合家族利益的政策。比如，挑选部长等官员时，肯定挑选对家族忠诚的人，而非损及家族利益的人。那些依靠政治家族获利的人，也希望维持家族政治，确保自身利益。”[2] 这一方面阻止了社会各阶层的正常流动，不利于社会的整体进步，使得一些政治大家族将家族利益置于社会整体利益至上，另一方面更是在无形中为腐败问题提供庇护，与政治大家族关系良好成为腐败分子的护身符。

二、社会发展滞后拖累可持续发展

大国崛起需要坚实的社会支撑，国民需要在意识理念、教育水平、族群融合等层面做好崛起的准备。反观印度，其经济增长未能有效转化为社会发展，国民素质有待提高，族群冲突难以消除，根深蒂固的种姓制度及“重精神、轻物质”的传统文化又使之缺乏推动变革的持久动力。也就是说，印度社会在物质与精神、阶级与种姓、地域与族群等方面，都存在比较严重的失衡，崛起之路显得有些“根基不稳”。

印度经济增长未能有效转化为社会发展，国民素质有待提高，族群冲突难以消除，根深蒂固的种姓制度及“重精神、轻物质”的传统文化又使之缺乏推动变革的持久动力。

（一）传统文化“重精神、轻物质”，使印度缺乏经济发展的心理驱动力

民族文化与经济发展具有很大相关性，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论述了新教对资本主义的推动作用，国内外很多学者论述儒家文化与中国经济发展成就间的关系。对印度来说，在对社会影响最深远的种姓制度中，主持祭祀的婆罗门是最高种姓，而从事商业活动的吠舍仅处于第三种姓。商人种姓“在印度等级森严的种姓阶梯中处于较低的地位，往往同黑市交易、投机倒把和高利贷者联系在一起”。[3]“印度的马基雅维利”考底利耶（Kautilya）指出，“商人无盗贼之名、却有盗贼之实，应阻止其压迫人民”，“应该通过严厉的律法，惩戒其通过组建卡特尔控制物价、获得额外

1 Niraja Gopal Jayal and Pratap Bhanu Mehta, *The Oxford Companion to Politics in India*, Student Edition, New 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p. xxvi.

2 2011年9月16日，笔者在人民党（Janata Party，该党已于2013年8月11日并入印度人民党BJP）主席苏布拉马尼亚·斯瓦米（Subramanian Swamy）家中，对其进行访谈，其做如上表述。斯瓦米是印度著名的政治家和经济学家，1990—1992年任计划委员会委员和商务部长，2011年前在哈佛大学讲授经济学，是近年来印度2G丑闻的揭发者，著有大量学术和政治著作，同时具有较强的印度教民族主义思想。

3 孙培钧等：《印度垄断财团》，北京：时事出版社，1984年版，第297页。

利润、出售欺诈获取的财物等”。[1] 1947年印度独立后，由于没有经过大革命的洗礼，传统文化未曾经历有效的扬弃，一些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因素依然根深蒂固地存在，其重要一点就是对商业活动的漠视或者歧视。尼赫鲁曾表示：“在整个历史中，古老的印度理想对政治和军事上的胜利并不赞赏，它蔑视金钱以及那些以赚钱为职业的阶级。光荣与财富并不同行，至少从理论上讲，光荣属于服务社群但自己却几乎没有得到任何金钱回报的人们。”[2] 以尼赫鲁为首的第一代领导人强调对经济活动的监管，英迪拉·甘地还在其任内推动大规模的国有化改革。经济改革后，企此家地位得以提高，对政府影响力大大提升，但印度民众并未完全摆脱传统文化的影响，大企业家仍主要来自传统上从事商业活动的种姓，各政党虽然需要商界的资金支持，但其出发点更多地为了筹集竞选资金。实际上，“印度传统文化的主体印度教是一种‘出世’文化，重在精神修炼，不甚重视物质文化。印度传统文化的基因与过度重视物质文明的所谓‘崛起’文化是格格不入的。崛起概念只是一部分印度精英的理念，在印度很难真正成为全民理念”。[3]

（二）森严的等级制度不利于阶层流动，影响社会发展活力

印度历届政府都反对种姓制度，但这一延续数千年的制度短期内难以解决，种姓依然在很大程度上与一个人的身份相联系，最典型的就是印度国内“种姓政治”的出现。[4] 印度著名贱民领袖、“宪法之父”安贝德卡尔博士形容印度教社会“是一座多层的塔，却没有从这一层到那一层的阶梯，人们将永远困死在其中的某一层”。种姓制度的森严等级，严重影响社会阶层流动，低种姓经济社会地位长期得不到改善。有学者尖锐地指出，“虽然经济自由化为社会底层公民提供比先前更多的机会，但依然存在对穆斯林和低种姓印度教徒（如贱民）的严重歧视。印度贱民研究所2009年研究报告显示，在寻找就业时，贱民和穆斯林的面试机会只有高种姓印度教徒的2/3和1/3”，社会歧视与腐败并列为加剧社会不公的两大因素。[5] 此外，虽然工商人士出身的议员数量在增加，但落后阶级在议会的代表仍然不足。穆斯林约占印度总人口13%，但2004年和2009年两届大选中，

1 Kautilya, *The Arthashastra*, translated by L. N. Rangarajan, New Delhi: Penguin Books, 1992, p. 67.

2 转引自[印]迪帕克·拉尔：《印度均衡：公元前1500—公元2000年的印度》，赵红军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90页。

3 林利民：《印度“崛起”提供的发展模式》，《瞭望新闻周刊》，2006年1月9日，第62页。

4 “种姓政治”是指通过炒作种姓问题，赢得某一特定种姓的选民的支持，从而服务自身政治利益的现象。比如，在印度人口最多的北方邦，前邦长玛雅瓦蒂高举“保护贱民利益”的旗帜，赢得广大贱民选民的支持，多次赢得大选出任邦首席部长，被称为“贱民女王”。

5 Basharat Peer, “India's Broken Promise: How a Would-Be Great Power Hobbles Itself,” *Foreign Affairs*, Volume 91, Issue 3, 2012, p.15.

穆斯林议员占人民院议席总数的比例仅为6.26%（34人）和5.16%（28人）。[1] 2014年问鼎总理宝座的莫迪长期执政的古吉拉特邦，在1989年到2014年的历次大选中均无穆斯林当选议员。[2] 更为严重的是，数千年的种姓制度磨灭或摧垮了人们改变命运的意愿和努力，“宿命论”非常普遍，与强调自立创新的基督新教及经世济国的儒教形成鲜明对比，陈旧的宗教观念和社会结构无疑制约了印度经济的发展。

（二）社会发展失衡拖累印度崛起整体质量

其一，贫富失衡。印度是全世界贫富差距最严重的国家之一。一方面，印度拥有塔塔（Tata）、信实（Reliance）等全球一流私营大企业，“该国最富有的55名亿万富豪总资产达2500亿美元，相当于年国内生产总值的1/6”，[3] 且有54人入选2013年3月福布斯富豪榜（全球共1342人）。另一方面，印度拥有大量贫民窟和全球最多贫困人口，迄今仍有约4. 55亿民众生活在世界银行设定的贫困线（每天消费低于1. 25美元）之下。印度计划委员会调查报告指出：“印度财产分配极端不公，最富有的5% 家庭拥有38% 的财富，而底层60% 家庭仅拥有13% 的财富。”[4] 其二，区域失衡。印度政府在很长时间里，将更多的发展预算投入到西部和南部的沿海各邦，加上这些地区传统上就有庞大商业阶层，其发展速度大大快于东部和东北部各邦，导致印度区域经济发展失衡扩大。“印度超过一半贫困人口生活在四个邦，即比哈尔邦、北方邦、中央邦和奥里萨邦，这四个邦约2/3人口生活在农村地区”。[5] 其三，增长与发展失衡。印度“有增长、无发展”，社会福利改善缓慢。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布的《2013年人类发展报告》，印度人类发展指数2012年排名136位，比2010年排名滑落17位。[6] 这种发展失衡与社会福利落后的局面，既是发展失衡的结果，也将反过来拖累经济发展的质量。其四，产业结构失衡。印度种姓制度将掌握知识的婆罗门作为最高种姓，而从事具体生产活动的群体则多为“贱民”，这深刻影响印度教育结构与发展模式。一面

1 “Number of Muslim MPs in Lok Sabha Drops,” May 20, 2009, http://election.rediff.com/report/2009/may/20/loksabhapoll-number-of-muslim-mps-falling.htm,2014-4-15.

2 “Lok Sabha Polls: 25 Years, Zero Muslim MPs from Gujarat,” *Times of India*, April 16, 2014.

3 Ruth Fremson, “India's Way: Billionaires' Rise Aids India, and the Favor Is Returned,” *New York Times*, July 27, 2011.

4 Ritika Chopra, “Income Gap Between Rich and Poor has Widened, Says Planning Commission,” http://indiatoday.intoday.in/story/rich-and-poor-division-penury-hdr-planning-commission/1/157212.html,2012-3-28.

5 Joydeep Mukherji, “Economic Growth and India's Future,” Occasional Paper, No. 26, Center for the Advanced Study of Ind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March 2006, p. 3.

6 UNDP,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2013,” 2013, http://www.undp.org/content/dam/undp/library/corporate/HDR/2013GlobalHDR/English/HDR2013%20Report%20English.pdf, p. 143,2014-3-28.

是高等教育发达，拥有大批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才，另一面是文盲率居高不下，缺乏足够的熟练技术工人；一面是软件、金融等代表的服务业发达，另一面是农业和制造业的落后。鉴于服务业吸收劳动力能力有限，现有发展模式伴随而来的是严重的就业问题。如果政府无法为新增劳动力提供就业机会的话，劳动力资源非但无法有效转化成“人口红利”，难以实现包容式增长，且可能增加社会不稳定因素，羁绊印度的经济社会发展。

三、国内安全现实威胁侵蚀发展成就

印度长期面临三大安全威胁，即左翼激进势力、宗教极端势力和东北部分裂势力。这三股势力因其深刻的历史成因，短期难以消除，并侵蚀着印度的经济发展成就，冲击社会稳定，是妨碍印度崛起的严重内患。

左翼激进势力、宗教极端势力和东北部分裂势力，成为妨碍印度崛起的严重内患。

（一）宗教极端势力加深社会隔阂

印度存在严重教派冲突，三次印巴战争、锡克教徒争取独立建国的“卡利斯坦”运动、国内穆斯林和印度教间的多次大规模冲突、印度教极端主义针对基督教的袭击行为，都是其教派冲突的真实写照。长期的教派冲突滋生了宗教极端势力，主要包括伊斯兰极端势力和印度教极端势力。进入21世纪，伴随着国际伊斯兰极端势力的活跃、猖獗，印度的伊斯兰极端势力非常活跃，不时以大中城市的关键设施为袭击目标，曾袭击新德里议会大厦、孟买证券交易所等。2008年孟买“11·26”恐怖袭击重挫投资者对印度投资与安全环境的信心，美国《华尔街日报》称“恐怖分子使印度商业中心陷入瘫痪，整个孟买都因恐慌而陷入停滞”。[1] 目前，穆斯林作为印度最大少数族群，“在识字率、就业率和收入上都远落后于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印度教徒，甚至也落后于其他少数族群，可以说是印度‘最为弱势’的群体”。[2] 这种弱势地位加上血腥冲突的记忆，为印度境内伊斯兰极端势力提供了土壤。同样令人担忧的是，印度教极端主义势力膨胀，经常侮辱乃至袭击穆斯林和基督徒，影响西方投资者对印度的信心。在印度教徒占多数的邦，印度教极端势力经常打着“振兴印度教”的旗号，而不被政府所警觉，其暴力行径有时甚至得到默许。2002年，古吉拉特邦印度教徒对穆斯林的暴力行径导致数千人死亡，冲击了古吉拉特作为经济最有活力之邦的形象。2008年8月，奥里萨邦一名印度教领袖被基督徒杀死，印度教徒随后对基督徒予以暴力袭击，

1 Yaroslav Trofimov and Peter Wonacott, “Terrorists Paralyze India's Business Capital,” *Wall Street Journal*, November 28, 2008.

2 Carin Zissis, “Terror Groups in India,”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November 27, 2008, http://www.cfr.org/publication/12773/, 2011-12-31.

导致数十名基督徒被杀、上千人逃难，引起西方社会的强烈关注与抗议。美国著名智库史汀生中心（Henry L. Stimson Center）在其研究报告中，将印度教极端组织、印国内伊斯兰极端分子、以巴基斯坦境内为依托的伊斯兰极端分子，都作为印度面临的宗教极端威胁。[1] 目前，印度国内的教派矛盾有所缓和，但极端势力并未彻底消除。2014年大选，曾因在2002年古吉拉特邦骚乱中“不作为”的莫迪顺利问鼎总理宝座，可能加剧穆斯林的不满，不排除极端势力滋生，破坏安全稳定，进而恶化投资环境的可能。

（二）东北部民族分离问题和宗教矛盾痼疾难除

印度东北地区[2] 民族众多，教派林立，长期面临民族分离势力问题，其中尤以阿萨姆邦为“重灾区”。20世纪80年代以来，阿萨姆邦民族分离武装与政府间的冲突已造成逾万人死亡。这里的分离势力主要有“阿萨姆联合解放阵线”和“博多民族民主阵线”等。近年来，印度政府通过加速东北各邦的经济建设、加大“招安”力度等措施，力图削弱分离武装实力，特别是鼓励本土民众移民东北地区，改变当地人口结构，对民族分离武装的群众基础进行“釜底抽薪”。2008年7月，辛格政府出台《东北地区2020年远景规划》，计划大幅加强东北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当地农业和工业发展，跟上国家快速发展的步伐。[3] 但当地安全形势并未完全落稳，残留分离武装在无力进行武装对抗的情况下，倾向于采用恐怖袭击的手段，阻挠政府的经济建设。2008年10月30日，阿萨姆邦首府发生18起连环爆炸，造成至少60人死亡，逾300人受伤。2012年7月，阿萨姆邦最大少数民族博多族和主要来自孟加拉的穆斯林移民，因抢夺资源发生暴力冲突，导致近百人死亡、数万人流离失所，甚至波及孟买、班加罗尔等内地大城市，出现大量东北部务工者逃离的现象。东北部作为印度经济最落后地区，素来被称为“印度的后湖”，当地政府的腐败、薄弱的经济基础、破落的基础设施，以及根深蒂固的族群矛盾，使之难以赶上发达各邦的发展速度，最终拖累印度整体发展。此次阿萨姆邦骚乱事件还表明，随着东北部与印度内地的整合加强，东北部地区的族群冲突可能蔓延至内地，影响孟买、班加罗尔等经济中心的发展。

（三）左翼激进势力干扰经济活动

印度左翼激进势力始于20世纪60年代末期的“纳萨尔巴里运动”。当时，

---

1 Michael Krepon and Nate Cohn, *Crises in South Asia: Trends and Potential Consequences,* Henry L. Stimson Center, September 2011, pp. 16-18.

2 印度政府将“阿鲁纳恰尔邦”划入东北地区，与阿萨姆邦、曼尼普尔邦、梅加拉亚邦、那加兰邦、特里普拉邦、米佐拉姆并称为“七姐妹”，其中的“阿邦”是中国“藏南”地区，被印度非法占领。

3 “North Eastern Region Vision 2020,” http://mdoner.gov.in/writereaddata/newsimages/final6963338914.pdf,2011-10-8.

由于土地改革不彻底，下层农民在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激进派的领导下开展武装斗争，史称“纳萨尔巴里运动”。后来，大规模武装斗争遭到政府的强力军事镇压，左翼激进势力被迫转入地下，坚持武装斗争至今。印度情报机构“研究分析处”（RAW）估计左翼激进武装拥有2万人的武装规模，[1] 其活动区域被称为“红色走廊”，主要是比哈尔、西孟加拉等经济发展滞后的邦，并蔓延到马哈拉斯特拉邦、安得拉邦等相对发达的地区，影响范围辐射到近20个邦、200个县（印度全国共有630个县），被印官方称为“最严重的国内安全威胁”。[2] 近年来，印度政府不断加大对左翼激进武装势力的打击力度，2009年11月发起“绿色狩猎”（Operation Green Hunt）军事围剿行动，但收效甚微。左翼激进势力最常见的手法是破坏基础设施，印度内政部官员2012年8月28日在向议会做书面陈述时称，“2009—2011年，左翼激进势力针对与经济活动相关的基础设施（企业、铁路、电站等）的破坏活动大幅减少，但仍多达1183起”。[3] 此外，左翼激进势力藏匿和活跃的地区多为矿产资源丰富的山区，森林密布、道路复杂，熟悉地形的激进武装经常袭击在当地开矿的企业，或者索要“保护费”，或者干脆将企业赶出去，企业主叫苦不迭。据报道，“由于印度政府无法有效打击左翼激进武装，印度在矿产资源开发方面的损失高达800亿美元。”[4] 印度内政部甚至警告称，左翼激进势力的新战略是“派遣受过良好教育的成员及其同情者，渗透进与高速公路、航空、铁路、海运、电信、农村发展等相关的部门，以便在关键时刻破坏印度经济。”[5] 左翼激进势力是经济发展失衡、贫困人口众多的产物，同时也反过来羁绊印度经济发展。

四、余论

国际上关于印度崛起的讨论由来已久，总体上持积极看法。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在《大外交》一书中曾预测，“21世纪……至少会有六大强权：美国、欧洲、中国、日本、俄罗斯，可能再加印度”。[6] 1991年经济改革后的高速增长，使得印度的综合国力大幅提升，向国际社会展现了一个朝气蓬勃、潜力巨大的印度。

1 Dean Nelson, "Maoist Rebels Threaten to Derail Indian Elections," *Telegraph*, April 22, 2009.

2 Ajit Doval, Former Chief of the Intelligence Bureau, "Growth of Maoists Fuelled by Politicians," http://www.vifindia.org/article/2007/december/23/Growth-of-Maoists-Fuelled-by-Politicians, 2012-10- 8.

3 "Marginal Dip in Maoist Violence," *Times of India*, August 29, 2012.

4 Rajesh Kumar Singh, "Maoist Hideout Threatens $3 Billion Steel Plant: Corporate India," *Business Week*, http://www.businessweek.com/news/2012-08-28/maoist-hideout-threatens-3-billion-steel-plant-corporate-india, 2012- 8-31.

5 Dinesh Sharma, " 'Maoists' New Plan to Cripple Indian Economy," *Zee News*, October 7, 2011, http://zeenews.india.com/news/nation/maoists-new-plan-to-cripple-indian-economy_735365.html, 2012-8-25.

6 [美]亨利·基辛格：《大外交》，顾淑馨、林添贵译，海口：海南出版社，2010年版，第16页。

在很多人看来，印度的国土人口规模、强劲的私企活力、丰富的劳动力储备、庞大的中产阶级等，都使得其崛起是板上钉钉的态势，存疑的只是崛起的速度快慢。所以，过去10—20年，“金砖贵族”、“世界办公室”等光环笼罩着印度，西方舆论更是炒作“龙象之争”，对印度期许有加。印度一些战略思想家于2012年初推出的《不结盟2.0: 21世纪印度外交与战略》也指出：“过去20年里，印度的经济和社会经历了无与伦比的变革……印度将成为塑造人类未来进程的力量之一，其成功将在国际舞台留下鲜明印迹。”[1] 但由于受到欧美经济危机的冲击，印度经济增长态势在近两年急转直下。2012年以来，政府贱卖煤矿的腐败丑闻、引发大逃难的阿萨姆邦骚乱、被称为史上最严重停电事故的“印度大停电”，更暴露出印度崛起过程中的种种问题，导致西方舆论集体转向，发出“别了、印度奇迹”的论调。

实际上，对印度崛起前景，无论是看好还是唱衰，都是不客观的，或者有失偏颇。印度本身就是“不可思议的”（Incredible，印度官方旅游推介词）矛盾综合体：印度追求世俗主义的目标，但其独立本身就是宗教矛盾的产物；在尚未有相当规模、受过一定教育选民的情况下，就采取了民主制；在没有实现工业化的情况下，就转向服务业驱动的模式；民主制度延续至今，伴随着喧嚣、腐败与决策迟缓，却从未受到过军事政变的威胁；腐败是拖累经济发展质量的重要因素，但经济发展增大寻租空间，反过来又会加重腐败。因此，本文并非对印度崛起前景予以明确否定，而是强调从长远态势来看，印度完全有可能崛起为世界性大国，但国家崛起是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任何因素（特别是国内问题）都可能阻断崛起进程。回顾历史上的大国崛起进程，新兴大国只有在有效实现国内政通人和、具备实现崛起的机制保障的情况下，才能真正实现可持续发展。如果仅仅是片面的经济与军力增长，而没有政治、社会、文化等领域的配套发展，无疑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目前，印度在政治、社会、国内安全等领域都面临巨大的挑战，对其经济发展的制约日益显现，都为其崛起前景打上巨大问号。

1 Sunil Khilnani, et al., *Non-Alignment 2.0: A Foreign and Strategic Policy for India in the Twenty First Century*, February 2012. 该报告研究小组受到印度国防学院（National Defence College）和政策研究中心（Centre for Policy Research）支持，成员包括著名战略家，高级官员和退役将领，如前外秘萨仁山（Shyam Saran，相当于外交部常务副部长）、前国防学院院长普拉卡什·梅农（Prakash Menon，中将）等，时任国家安全顾问梅农曾参加课题组的讨论。该报告是近年来印度战略界发布的最有影响力的政策报告，受到印度国内外的广泛关注。